



陳尚勝

中外交流需建制度平台

由各國史學會共同參與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於8月在濟南召開，屆時預計有近兩千歷史學者與會。在內地熱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由海、陸「絲綢之路」所引發的歷史上中外交流問題，勢必也會成為與會學者們關心的話題。以史為鑒，歷史上對外交流中的成與敗，究竟可以為我們今天提供哪些參考？山東省政協常委、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陳尚勝教授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中外交流需要建立公平制度平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于永傑 濟南報道

作為中外關係史領域專家，陳尚勝是從明清王朝對外政策開始思考的。「隨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多人開始推崇鄭和下西洋。不過，明朝的這項龐大的航海活動，為什麼沒能持久進行下去呢？」陳尚勝認為，明成祖後六次派遣鄭和下西洋（明宣宗還曾派遣一次），是基於他通過軍事政變手段登極後缺乏政治權威而採取的一項重大措施。也就是說，鄭和下西洋所帶來的所謂中外交流盛況，完全是封建君主個人政治需求的結果，而缺乏國家層面的持續動力。

明朝：對外交流只是官方「獨角戲」

「我所說的國家層面動力，包括官方與民間兩個方面。但在鄭和下西洋時代，明朝的對外政策在官方與民間兩個層次上卻是對立的。」他指出，以禁止中國商民從事海洋生產與貿易活動為內容的「海禁」政策，在明成祖統治時期不僅繼續存在，而且更加嚴厲。其中一項重要證據就是，下令將沿海一帶民間尖底海船統統改成平底船，使船隻失去在海洋上的航行能力。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英國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執行的《航海條例》。1651年頒布的《航海條例》規定，凡從亞洲、非洲、美洲運往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貨物，必須由英國船隻或英屬殖民地船隻運送，不允許其它國家商人在英國從事運輸業和商業活動。

由此可見，英國《航海條例》與明朝「海禁」政策有着根本不同，它旨在保護本國商民在海洋活動利益。通過對中西歷史的比較，陳尚勝認為我們應該反思的問題是，在一個國家對外交流過程中，應該是官民合力向外推進，而不應僅僅是官方力量的「獨角戲」。

清朝：政策錯位致內外商不公平競爭

陳尚勝指出，清朝實行「海禁」政策的時間相對較短，在統一台灣後即被解除。然而，社會中一個固化的歷史觀念則是：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閉關鎖國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落後挨打。

所謂清朝「閉關鎖國」論，其實源於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英國，它是工業革命發生後英國商人對華貿易擴張受挫而出現的言論，在本質上是西方霸權話語，因為一個處於農業文明階段的國家還談不上對外開放的問題。

陳尚勝解釋稱，而從英國自己頒布的《航海條例》來看，他們指責清朝閉關鎖國的言論帶有明顯的虛偽性。從日本江戶幕府一直實行鎖國政策來看，閉關鎖國也不一定就導致落後挨打。因此，有關清朝對外政策對中國近代社會所造成影響還必

須具體研究。

經過對清代對外貿易政策的深入分析，陳尚勝發現清朝嚴禁本國商民打造大型船隻出海，限定本國商船載重量為五百石（約合330噸左右）的措施，使得本國商民在國際貿易競爭中首先在航海能力上處於劣勢。而英國最初來華商船雖然平均噸位還不到200噸，但1815年就躍升到1200噸。

又如限制本國出海商船攜帶自衛武器一項，使東南亞海域的海盜可以很容易對中國商船進行搶劫；還有對本國出海商人經銷生絲和茶葉所做的規定，使得本國海商失去了很多在世界市場上優勢商品的國際貿易機會，反而使外商從經銷中國茶葉中大發其財。

另外，根據他的測算，在清朝海關所徵收的關稅中，除「貨稅」按貨徵收待遇相同外，所徵收的「船鈔」（噸位稅），中國商船繳稅率為其貨物總值的0.85%，外國商船則為0.75%；而所徵的「規禮銀」，中國商船所繳納的稅率，更遠遠高於外國商船上對外開放的問題。

顯然，清朝所制訂的具體國際貿易政策，更利於外商卻不利於內商。而制訂這種政策的指導思想，則分別是儒家的「懷柔遠人」和法家的「重農抑商」，由此導致內外商人在國際貿易待遇上的不公平性，這恰恰是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問題所在。



■山東省政協常委、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陳尚勝。

本報濟南傳真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於八月份在山東大學舉行。圖為5月舉行的百日倒計時活動。 本報濟南傳真

談及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陳尚勝指出，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國與西方國家交流之路，歷史上中國封建王朝經營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制度平台卻不完全相同。具體來說，漢、唐等王朝之所以「通西域」並積極經營西域絲綢之路，主要是為了應對北方遊牧民族勢力的挑戰，尋求在中亞地區合作的國家。

因此，中國封建王朝開展與西域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交流，主要是通過朝貢制度來實施的。中國封建王朝派遣使團招徠外國，並對外國王進行冊封，而將外國使

亞洲貿易圈歷史上依靠互市

團來華視為「朝貢」，並給予其豐厚的物質利益，以體現儒家的「厚往薄來」原則。這一制度的主要功能在於建立周邊防禦體系，維護邊疆安全。但在這一制度下，並沒有國內普通商人出境貿易的法律空間（甚至玄奘也是偷出國境），外國商人完全壟斷了西域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

古代亞洲海上貿易圈以中國為中心

但海上絲綢之路卻完全不同。儘管在漢唐時期印度和阿拉伯商人曾在海洋絲綢之路上佔有主導位置，但到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閩、南漢等政權，即根據自身的靠海優勢鼓勵商民出境航海貿易。而宋朝建立後，即根據吳越等國的經驗採取互市制度，設立多處市舶司（古代海關）口岸，鼓勵本國商民出海貿易。

據韓國史書《高麗史》的記載，自公元1012年至1278年間，宋朝商船前往高麗貿易就有130次，共計達到4948人。如果再加上前往日本、東南亞以及印度洋沿岸地區的中國商人，其規模則十分龐大。而鄰國商人來中國港口貿易也十分頻繁，從而促進了中外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隨着亞洲海域貿易的發展，宋朝銅錢也開始成為東亞

區域的國際貨幣。由於貿易的經常化，商業誠信也開始確立，東亞海域貿易開始出現預付訂金以及貿易貨款等新的商業制度習慣。由此可見，自10世紀以後，隨着互市制度的確立，亞洲海域開始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貿易圈。而宋元時期互市制度，對於中外海商在經營貨物種類以及關稅待遇上一律平等，並有防範貴勢力走私貿易的制度規定。

「倭患」致中外交流失民間基礎

十分遺憾的是，這種鼓勵中外普通商民從事海上貿易的政策，到明朝時因沿海頻發日本海盜搶劫事件，採取「海禁」政策而終止了，明朝的浙、閩、粵三個市舶司也變成了專門接待海外國家「朝貢」使團的機構，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失去了民間基礎。

而在鄭和下西洋結束後70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通過「新航路」的發現，從東西兩個方向來到亞洲海域；新航路的發現使得原來區域性的市場開始連接成世界市場，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成為西方商人追逐利潤的最佳商品，中國沿海百姓也紛紛下海經商。因此，16世紀以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貿易活動大規模興

起。然而接着就發生了延續十餘年的「嘉靖倭患」（1552-1564）。

所謂「嘉靖倭患」，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參加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搶劫和燒殺活動的海盜，其實日本人所佔比例不大，大多數是中國走私分子，還夾雜有葡萄牙人等西方人。這些走私分子之所以走上武裝叛亂這條道，恰恰是走私活動的內部結構和矛盾的結果。

這也從反面證明，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如何設計並利用公平合理的制度平台，最大程度地調動民間力量參與國際經貿活動與文化交流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這個國家的實力發展和國運興衰。



資料圖片

「80後美女教授」鄭璐：走最正的路 唱最美的歌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實習記者牛琰 南昌報道）被媒體譽為「紅歌天后」的鄭璐（Lucy），集歌手、省政協委員、愛心形象大使、志願者等身分於一身，「在推廣公益志願文化上，我要用歌唱響社會主旋律，傳遞正能量。」這是她的不懈追求。

不追名利只追夢

身為「80後」，鄭璐從南昌大學的一名助教，到破格晉升的聲樂副教授，用6年時間獲得兩次國家級獎項、七次省部級獎項。而在她中文核心期刊等學術刊物上發表的《關於高校聲樂課堂問題的探析》、《試論當前高等師範聲樂教學改革中存在的幾個突出問題和對策》、《贛南民歌綜述》、《試論音色在聲樂演唱中的美學特質》、《淺談聲樂藝術中的情感表達》等論文，也印證着她的努力。

「並不是每個人做事都有目的性，我做事不為別的，只為唱歌。」鄭璐說，在獲得2010中國紅歌會冠軍之前，自己只是南昌大學一名普通的聲樂教師，做一名好老師是自己的目標。紅歌會奪冠後，她放棄

眾多機會，依然堅守在學校裡教書育人，學生們親切的稱呼她「美女教授」。

鄭璐自創了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用自己的演出經驗實地教學，讓學生在唱紅歌時，首先去了解歌曲創作的背景，領悟歌曲裡面的情感內涵，其次再讓他們知道演唱的最高境界是聲情並茂，演唱的最佳效果是與觀眾產生共鳴。「我的很多學生現在都愛唱主旋律的歌。」

「發自內心，才能展現音樂之美」

鄭璐自曝最喜歡鄧麗君的歌，幼年時走在大街小巷，《甜蜜蜜》、《小城故事》、《夜來香》等鄧麗君的歌從遠處飄來，自己總會停下腳步癡癡地聽，她認為「只有發自內心的歌唱，才能真正展現音樂之美，才能真正打動人心。」

在她看來，用歌聲聯繫群眾，唱響社會主旋律，傳遞社會正能量，也是政協委員履行職責的一部分。

2008年5月，鄭璐作為主要演員參加江西省汶川地震大型賑災義演；2010年7月，與2010年中國紅歌

會十強選手頂着驕陽、冒着酷暑，驅車200多公里來到當年洪水重災區都昌縣，深入大港鎮洲上村慰問受災村民；走進太陽村關愛特殊孩童，為孩子們高唱紅歌……談及公益演唱的次數，她笑稱「次數太多，記不清楚了」。

為孩子們發聲

當選江西省政協委員後，鄭璐積極為「虐待兒童現象」和「青少年思想文化引領」等問題發聲。「從微信、微博和網站上，經常能看到一些虐待兒童的現象發生，但社會在對於被虐待青少年身體和心理的治療方面目前仍是空白。」

鄭璐稱，在去年江西省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聯組討論會上，她關於《建立關愛留守兒童長效機制的建議》的發言引起了江西省領導和相關部門的重視，這讓作為「微愛留守公益愛心大使」的她感到很欣慰。未來她仍將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廣公益志願文化上，「我希望盡自己有限的能力，能給留守兒童多一些幫助，為孩子們盡心出力。」



資料圖片



2011年鄭璐與周立波合作演唱《燭光裡的媽媽》。 本報南昌傳真



本報南昌傳真



與太陽村鄱陽湖兒童救助中心的孩子在一起。 本報南昌傳真